



《大学》中的德治理念

肖新平

《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个单篇，西汉武帝时收录于《小戴礼记》，后来简称《礼记》。宋代理学兴盛有了“四书”，并且出现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确立科举考试第一场从四书内出题并结合朱熹的《章句》《集注》进行论述，后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继承，继而演变为八股取士，于是四书成为参加科举的必读书目。作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彼此是相互关联与呼应的，都以仁政德治为主要思想，都贯穿着修齐治平之道。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首先明确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德治理念：“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某种意义上，《大学》是提出“修齐治平”思想的总纲，而《中庸》《论语》《孟子》则是相应的具体阐发实施办法或方案，从而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的较为完整与系统的德治体系。因此，总体认知《大学》的德治理念有其必要性。《大学》中的德治理念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爱民如子。“《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爱民如子是治理者与人民的关系，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要引导、教诲、关爱、扶助，并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从而维护尊长的权威，这一理念带有鲜明的家庭家族的亲情与人伦色彩，同时也强调了治理者的家长式权威；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姓即子民应如子女对待父母一样对待国家与父母官，忠于国家与孝敬父母是合二为一的，亦即孝忠合一、家国一体，也是中国“家国同构”治理理念的重要体现与渊源，这与《论语》中于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及富之、教之等思想相呼应。家国同构的治理理念与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而产生了精忠报国等爱国主义传统；此外，后世的忠臣贤相与清官廉吏也多以父母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体现出爱民如子的尊长的关爱与教导，这也是仁者爱人的仁政的表达，而好民所好、恶民所恶即“以民心为己心”，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爱民如子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拥护，进而实现国家的稳固与兴盛。“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则体现出治理理念与政策得到民众支持与认可则可治理好、守护好国家，这与孟子后来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义相关联。

以上率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上老老、上长长与上恤孤、君子慎独都体现了示范引领作用，以上率下的治理理念则强调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而《论语》中也一再强调领导者的以身作则，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权力可以分为职位权力与非职位权力，进而又可以分为法定权、奖惩权、强制权、专家权与参照权5种。在德治思想中，参照即示范权力具有关键性的

作用，且“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即使有职位权力，但若没有相应匹配的道德也会最终导致灾祸而失去职位。“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这让人想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而和谐的社会理想，如果领导者能够躬亲示范、带头引领，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个人品德等方面作出表率，那么上行下效，社会治理肯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同理，上梁不正下梁歪，桀纣之类的贪图享乐、奢侈腐化、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者也会被唾弃，进而江山摇摇欲坠而灭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可谓德治最直接与最有效的途径。

以义为利。这主要体现在德本财末与国之义利两方面。德本财末观——“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国之义利观——“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德本财末与国家以义为利都强调了道德与仁义在治国中的首要与优先地位，这都离不开君子慎德，即有德而得众，得众而有土，有土而有财，故而“德本财末”。若外本内末则容易诱导民众争夺财利，这样会财聚民散。所以，德本财末说明国家的职能不是收税或聚敛财富，国家的职责应为藏富于民、加大投入，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财散民聚，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有聚敛钱财与贪腐的官员还不如如有盗贼，可见官员贪腐危害之深重，不仅造成国家的损失，更损害国家的公信力，导致失去民心，也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甚至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文化：清代海峡两岸之桥

潘志宏

清代，海峡两岸间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兴盛，儒家文化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迅速发展也折射出儒家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清代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象征。

在清代，许多大陆百姓，特别是福建、广东人，正是在这时移民到台湾，成为开发台湾最早的人群。台湾岛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然而台湾海峡中的“黑水沟”却成为航海者的噩梦，有无数航海者葬身在这片瞬息万变的深色汪洋之中。在横跨台湾海峡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成为支撑大陆移民的精神力量，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大陆移民冒险到台湾求生存和发展。

儒家文化促进清代两岸海洋交通及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清初，为了防范郑成功的北伐、隔断其与大陆居民的联系，朝廷颁布了海禁和迁海的政策法令。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大军收复台湾之后，台湾才重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康熙帝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于福建省。翌年，清廷宣布开界，海禁正式结束。台湾的收复，标志着清朝完成了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清朝统一台湾后，在台湾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广施恩惠仁政，培养道德风尚，消除战争气氛，以儒家文教礼乐治民。此后，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洋交通往来开始常态化，官员的调动、民众的出行、货物的运输、海洋的贸易等使台湾海峡的海上交通变得颇为忙碌。正如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所说的，“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例如，清人倪赞元提到：“北港实属海汊，通金、厦、南澳、日本、吕宋等处，商船萃荟。”当时的北港实际上是一个海湾城镇，位于台湾西海岸的中部地区，在清代时就是台湾的主要港口之一，而且是大陆民众移民到台湾垦荒的重要登陆地。北港与福建的金门、厦门，广东的南澳，甚至是日本和吕宋等地，都有大量的商船往来活动和频繁的海洋交通运输。这说明台湾与大陆以及海外海洋商业交通在海禁政策解除之后获得了巨大的释放，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此时得到有力的提升。清朝由于收复和统一了台湾，并且

当地政府以儒家文化作为主要的教化手段，使儒家文化在台湾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任何朝代。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推行也极大加速了两岸海洋交通运输和台湾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儒家文化引导清代台湾各移民族群和平相处。清代早期，台湾移民激增。有大量的大陆民众通过海上交通的方式到达了台湾，由于移民来自大陆不同的省份和地域，存在着生活习惯差异、语言沟通障碍和土地利益之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兴盛，也帮助台湾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台湾苗栗中港慈裕宫的《劝中坵泉漳和睦碑记》中就记载了这段具有象征性的历史。碑文指出，天地万物之中，以人类最为尊贵。而人与人之间，都是同类，更应该相亲相爱。所以，同在一国就应该相亲于一国之人，同在一乡就应该相亲于一乡之人，应该不分亲疏，不分地域。碑记引用了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孟子提出的“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以其中蕴含的和平思想来劝说各移民族群民众和睦平等、友好相处，既然已经同在台湾，就都是台湾人民，何必还要再分地域、省份之争。另外，碑记作者还以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教育和劝诫各族群，不要以祖籍地域作为乡亲分类的唯一依据，应当放下对不同地域族群间的对立情绪，重视亲情和邻里之情，将所有人全然视为亲戚、同类与家人，如此才是异于禽兽的人类社会伦理关系。最后，碑文发出倡议，希望各族群应当互相团结、和平相处、化解昔日恩怨、避免尔虞我诈，表达了各移民族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风淳朴敦厚、同享升平之乐的美好愿景。可以看到，当地政府希望将儒家文化作为宣传教育和和平观念的重要媒介以化解移民间的矛盾。因为儒家文化在两岸巨大的影响教化作用，几乎使闽粤两省的新移民和各族群化解矛盾、友好相处，如同一家人，足见儒家文化在清代台湾民众中展现出的亲和力。

儒家文化助力清朝统一台湾以及平定台湾的历次内乱。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海军在澎湖海域，消灭了郑军的主力，成功收复澎湖、台湾岛，统一全国。郑克塽投降清廷后，朝廷内部开始争论是否将台湾并入版图。施琅分析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认为台湾一地，虽然属于外岛，实际上是

关系到大陆四省的要害，所以舍弃台湾必定会酿成大祸，保留台湾确实能够长久地固守边疆，因此他坚决主张要保留台湾并入版图。最后康熙决定，台湾的弃或留关系重大，如果弃而不守，那就更加不可。施琅坚持收复和保留台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治台名将”蓝廷珍在平定台湾朱一贵事件归来后，上疏曰：“康熙六十年间，台匪倡乱，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骥亲统官兵前往讨逆。维时六月兴师，各士卒感佩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踊跃用命，但恐时值台飓频发之候，临行虔祝垂庇，果荷显灵默相，处处效顺。”蓝廷珍在奏疏中提到，在康熙六十年间，台湾匪徒造反作乱。蓝廷珍与施世骥带兵前往讨伐。当时正值六月，要兴兵出师，士兵们都踊跃听命效忠，但是担心台风飓风频发，临行时祈求平安，后来果然处处忠顺投诚，展示出将士们对朝廷的忠勇。清代另外一位平定台湾的著名将领福康安在奏折中提到，自从出兵台湾以来，运送钱财、粮食、铅弹和火药，很少有行船遭遇恶风而失事的。军队从崇武出发，一昼夜之间就行驶了千里之远，兵船共100多条，几乎同时到达鹿仔港。凯旋驻防的兵船遭遇恶风，转危为安，这都是依赖皇帝的诚敬和天神的护佑啊，显示出他对朝廷与君主的忠敬。通过这些史料不难看出，作为清代台湾海洋战事的亲历者，清代著名将领施琅、蓝廷珍、福康安等人对儒家文化的忠君爱国思想都颇为尊崇。可以说，儒家文化见证了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发展，帮助清朝统一台湾岛、平定了台湾的历次内乱。

在清代两岸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儒家文化在促进清代两岸海洋交通运输业和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帮助台湾早期各移民族群化解矛盾、和平相处以及在清朝统一台湾及平定台湾历次内乱的故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以施琅为代表的朝廷官员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宣传，使儒家文化在台湾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桥梁和文化枢纽。



北魏高允缘何被称“令公”

王 萍

高允（390—487年），字伯恭，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北魏时期著名政治家，丞相参军高韬之子，曾任从事中郎、中书博士、中书侍郎、镇东将军、中书监、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等。高允早年致力于学术研究，40岁时方步入政坛，可谓大器晚成，其从政生涯长达50余年，历任五朝君主，去世时年近百岁，堪称北魏政坛的“常青树”，并因德行高尚而被文成帝拓跋濬尊称为“令公”，深受众人爱戴。

直言劝谏

高允为官以直谏闻名，朝中之事凡有不当之处，他都要及时向皇帝进言指出，即便触怒圣颜亦毫不退却，拳拳为国之心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高允所辅佐的北魏君主们都对其十分信任和尊重。

北魏太武帝时，民间良田大都被官府封禁起来用作牧场或者苑囿，耕地面积大量缩减，导致大量百姓失地无依，京城游民遍地。高允对此深感不满，于是借入宫觐见之机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谏，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圈禁良田的危害，要求解除田禁，把良田交给农民耕种，太武帝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改牧为农”成为北魏复兴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高允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给事中郭善明为了显示自身才能，处心积虑劝文成帝修建宫殿，文成帝亦渐渐动心。而高允认为此时修建宫殿劳民伤财，于社稷无益，遂不惜败君王之兴，进言阻止，言辞也十分犀利。高允说道：如今建国已久，宫殿已然很完备，永安前殿足够用来接受万国朝会，西堂温室也足以让您休息，紫楼

的高度也足够看近望远之用了，如果想再修建一些更加壮丽精巧的建筑，可以慢慢筹备，不宜仓促开工。同时，高允还给文成帝算了一笔账，认为修建新宫殿粗算下来至少需要四万人忙碌半年之久，不仅朝廷耗费巨大，百姓的生活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文成帝听了之后，深以为然，于是打消了修建宫殿的念头。后来，高允认为文成帝对贵族在婚娶丧葬上奢靡铺张的行为不加限制，导致豪门大族竞相成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于是又上疏劝谏，历数当下奢靡之风上行下效之害，并直言文成帝作为一国之行应自下而上厉行节俭，以改进社会风俗。文成帝虚心接纳，世风为之一新。

献文帝继位后，高允又进言，主张在各郡国建立学校，推广教育，北魏在郡府设立学校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孝文帝即位后，高允又作《酒训》一文呈送给孝文帝，力陈酗酒有败德之害，建议孝文帝应在国内推行节制饮酒的措施，孝文帝看后十分赞同，常常把此文带在身边，时时告诫自己，警示众臣。

清廉自守

高允一生为国为民不惜性命，于己则淡然超脱、清廉自守，堪为人臣典范。文成帝在位时，高允已年过六旬，当初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人多已

封侯，高允曾经的属下当中也有100多人已经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却当了27年郎官还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对此高允也没有任何怨言，仍旧事事勤勉，不遗余力。当时朝廷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就经常让儿子上山砍柴采摘维持温饱。文成帝将高允提拔为中书令之后，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蒙圣宠，但是他家中十分贫困，妻子儿子都无以为生。文成帝听后亲自到高允家中查看，发现高允家仅有几间草屋，盖的是布被，穿的是麻袍，厨房里也仅有一点儿盐菜。文成帝心中感慨不已，下令赐给高允帛500匹、粟千斛，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对此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但文成帝都不应允，高允只好勉强接受。

孝文帝继位后，对高允十分倚重，常派人接他到殿中商量国事，太和年间，高允虽已是近百岁高龄，仍旧坚持批阅史书毫不懈怠。孝文帝见高允年事已高，担心其因政事繁忙、生活过于清简而影响身体，于是下令让乐部安排10个乐师每5天到高允家演奏一次，另外还赐给高允蜀车、几杖等，又赐了各种珍奇食物，按时节送到高允家中。没过多久，孝文帝又命朝廷负责膳食的官员，早晚给高允送膳食，每逢初一、十五给高允送牛肉和酒、衣服衣料。然而喜好音乐的高允只是偶尔听一听乐队演奏，把收到的其他赏赐悉数分给了亲友故交，

自己仍过着简朴的生活。

宽以待人

高允虽经常因直言国事而冒犯龙颜，但他平日待人处事十分和善宽容。北魏初年，法律十分严苛，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狱讼积压严重，各地的犯人久押未判，狱满为患，太武帝遂允许中书用儒家经义来判决疑难案件。用经义断案本无固定标准难以参照，判决或轻或重全凭断案者的理解，但高允认为狱讼之事关乎人的性命，应慎之又慎，因而断案时坚持以仁宽为本，同时又依据法律评判刑刑，朝廷内外都称赞高允断案公平公正。文成帝时，尚书竇瑾坐事被诛，其子竇遵逃亡到山泽之中不见踪迹，竇遵的母亲焦氏被收入官衙，后来焦氏因年老得以免罪，但竇瑾的亲友故交却没有愿意救济她，只有高允怜悯焦氏的遭遇，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将其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一过就是六年，直至竇遵获赦将焦氏接回侍奉。

孝文帝时，高允已是耄耋老人，孝文帝依然对其十分信任，经常召其入宫商量国事。为了照顾高允，孝文帝还特地派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他。一日天降大雪，苏兴寿扶高允入宫的路上，突然遇到一条恶犬，众人惊慌失措间使得高允滑倒在地，一千人等都非常害怕，而高允不但没有责

怪苏兴寿等人，还安慰了他们一番，事后也没有向皇帝提及此事。还有一次，孝文帝在西郊处理政务，突然想起了高允，于是就派人用御用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的板馆看风景，没想到半路上马忽然受到了惊吓狂奔不止，导致马车翻车，高允的眉骨三处受伤。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听说后赶忙派御医前去医治并亲自抚慰探望。因高允在朝中德高望重，官府要将驾车的人治以重罪，高允听说后连忙上奏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请求赦免驾车人的罪过，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虚怀若谷

高允学富五车，但他与同僚相处却是谦逊有礼，从不任人前卖弄学识、高谈阔论。高允与崔浩共同编修《国记》时，崔浩一心要作出一番功绩，曾经召集了诸多术士一同考校汉代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的情况，还找出了一些前代史书中的失误，并且另编写了一部《魏历》拿来给高允看。高允看完以后说：天文历法不能凭空而谈。要探讨古代之事，必然要在近代加以验证。并且指出了其中几处错误。但崔浩却十分生气，认为高允是不懂装懂，故意让他难堪。面对崔浩的质疑，高允也并不生气，只是淡淡说道：这个问题不是你我空口相争就能说明白的，还是应该详加研究调查才行。当时在座的人都对高允突

然懂得历法而感到奇怪，只有平日里与高允相熟的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数，他说的应该不会有假。此后的一年多里，崔浩又把高允所说的问题重新考究了一番，结果却真如高允所言，众人都叹服不已。

高允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十分尊重，不论是同僚还是下属，只要是有超越他的地方，高允都真心称赞佩服，并且乐于向朝廷举荐人才，积极提携有能力的后辈。中书博士平恒安贫乐道，喜好研究经籍，时任秘书监的高允对这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后辈非常看重，“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恒也”。文成帝、献文帝时期，涉及军国大事的书信檄文多出自高允之手，后来高允发现高允的文采比自己好，于是就向献文帝举荐高允来替代自己。南北朝时期，自恃清高、目中无人的文人大臣并不少见，高允能自始至终保持谦虚有礼，不嫉贤妒能的气度则显得弥足珍贵。

太和十一年（487年），97岁高龄的高允在家中安然去世。孝文帝悲痛不已，下诏赐绢1000匹，布2000匹，棉500斤，锦50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表丧葬之用。自北魏建国以来，从未有人得过如此多的赏赐，足见高允在北魏君王心中的地位之高。临下葬之时，朝廷又追赠高允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衔衔与爵位依旧，谥号文。高允去世后，其刚直耿介、清廉自守、宽厚仁善的品行操守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令公”美誉也一直流传至今。

